

我国农村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

陆学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农业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在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以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农村第二步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目前，农村面临三个方面的大问题。

农业问题

经过农村第一步改革，我国农村连续6年增产，1984年我国农业达到了高峰，粮、棉的绝对产量都为世界第一，人均占有量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1985年粮食大减产后，经过努力，粮、棉等主要农产品虽略有回升，但1988年的粮棉仍难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可是这4年人口增加了5600多万，城乡的消费水平又提高了，所以，1984年已略有剩余的粮食、棉花现在又紧张了，1987年我国又不得不恢复了粮食进口。当前农业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要坚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克服农业已经徘徊4年的局面，转到能够稳定增长和发展的轨道上来，二是要千方百计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为农业上新的台阶（2000年达到1万亿斤粮食等目标）和今后全国实现小康而准备好农业发展的条件。

1985年粮食大减产以后，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关于农业问题发生了新的争论，一种意见是要承认农业已经出现徘徊的事实，分析徘徊的原因，制订新的政策，使农业稳定发展。另一种意见则讳言农业面临严峻的形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数字来粉饰事实。《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5月有篇文章说，农业发展是正常的，根据是1986、1987年农业产值仍增长3.4%、4.2%。这个农业总产值中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的产值。这几年，林业、牧业、副业、渔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特别是副业中包括村以下的工业，这些年增长幅度很大，而粮棉为主的种植业，却是下降的，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绝对量是下降的。我们讲的农业是指以粮棉为主的种植业部分。农村经济现在有4个指标：

一、农村社会总产值，包括农村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



业服务业、1978年农村总产值2037亿元,1987年达到9431亿元,扣除物价因素,1987年比1978年增长2.3倍,平均每年增长14.2%。

二、农业总产值,包括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副业,1978年农业总产值1801亿元,1987年为3185亿元,比1978年增长76.8%,平均每年增长6.5%。

三、农作物种植业产值,1978年为1327亿元。1987年为2049亿斤,比1978年增长54.4%,平均每年增长4.9%。

四、粮食总产量,1978年为6095亿斤,1987年为8038亿斤,比1978年增长31.8%,平均每年增长3.1%。

从这些数字看,当前我国的农村经济还是很好的,大农业发展也还可以,但种植业则徘徊不前,粮食则更紧张了。

农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一方面人口增加,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向农业提出了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的需要;另一方面农业自身的供给能力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而徘徊不前,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了。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8146亿斤,人均占有792斤,当年消费7900亿斤,还略有剩余。1985~1987年连续3年粮食生产没有完成国家计划,1987年8038亿斤,人均只有748斤。这几年粮食消费每年增加150~200亿斤,总产已不能满足需求了,只能靠挖库存和进口来弥补。1984年我国生产棉花12516万担,当年全国有纱锭2200万锭,由于开工不足和掺用化纤,全年只消费棉花7000~8000万担。近几年全国纺纱业发展极快,1987年已超过2800万锭,加上出口和絮棉,年需用棉超过一亿担以上,1987年只生产8160万担,近两年全靠挖库存弥补,至1988年棉花库存挖得差不多了。

农业形势严峻表现在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一是耕地逐年减少,1981~1985年每年平均减少700多万亩,1986年减少900多万亩,1987年有关方面统计只减少299万亩,实际减少800多万亩。1987年人均耕地只有1.5亩了,全国有9个省人均耕地不到一亩。二是土壤肥力减退,有机质含量减少。黑龙江省是我国著名的黑土带,有机质含量是7~8%,由于森林过伐等原因,现在已降到5~6%,关内大部分地区的有机质含量只有1~2%。1976年全国绿肥面积有1.5亿亩,1987年只有6218万亩,减少了60%,平均每年减少绿肥722万亩,这也是有机质含量减少的一个原因。三是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有效灌溉面积一年年在减少。1980年以后就没有再建大的水库,已有的大型水利设施日益老化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六五”计划以前我国每年新增800~1000万亩灌溉面积,1980年以后不仅没有新增,反而是年年减少。统计资料说1986年比1980年减少1000多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实际还远远不止此数。全国现在约有3亿亩农田因缺水而长年受旱。四是农业生产工具落后,原有的农机具普遍老化、不配套,全国机耕面积1986年比1980年减少6800万亩,减少11.1%。使耕作普遍变浅导致病虫害增多和农作物不能很好生长。五是农业的生态环境变坏,由于乱砍滥伐,采育失调,全国森林面积减少1亿多亩,黑龙江40个林业局,已有8个局无林可伐,还有22个局只能再伐10年。以大小兴安岭为主体的东北林区正在缩小,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已由50年代的50%。下降到目前的13%。

我国两个热带林区正在消失，西双版纳林区已由总面积的60%降到30%；海南岛森林由占地35%，下降到7%。我国草原每年退化2000万亩，近30年来，累积退化约10亿亩，占可利用草场的1/3，而且这种退化速度还在加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正在扩大，黄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是16亿吨，近几年由于长江上游森林急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约为5亿吨，约为尼罗河、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三条大河输沙总量的总和。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土地沙漠化，内蒙古新增加沙漠1.1亿亩，南方一些省份如江西也出现了大片沙漠化的土地，目前全国沙漠已占国土面积的15.5%，沙漠化的土地每年以1500平方公里的面积在扩大。

农业形势严峻还表现在农用工业萎缩与倒退。农业要现代化，必须要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1980年以后，国家大量减少农用工业投资，加上这些工业本身没有适应农村改革后的生产形势和进口农药的冲击，不少农机厂改产转行，农药厂倒闭，1987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年产只有3.17万台，化学农药的产量只有16.1万吨，比1965年生产19.3万吨的水平还低，致使农药奇缺，许多能治的病虫害无药可治。1978年供应农村柴油837万吨，1987年只有846万吨，农用柴油1979年每马力占有100公斤，1987年只有40公斤。近几年的化肥、农药、薄膜、柴油严重供不应求。

农业形势严峻还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不佳。近几年国家一再强调要支援农业，为农民服务。但在商品经济规律的驱使下，一些行业和部门却想从农民身上赚钱，而不是为农民服务。一号文件和二号文件常常矛盾。国家把平价化肥、柴油拨下去了，经过若干环节，平价的变成议价、高价的了。1988年的化肥、农药、薄膜上涨是100%以上。这些物资本来不足，市场上买不到，但库存量却很大，这就是有部门有人在捣鬼，奇货可居，待高价而沽，这既损害农民利益，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农业生产，误了农时，减产是必然的。

农业形势严峻的最主要方面是农民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近几年受到挫伤，农业生产没有活力。农民不爱种田，特别是不爱种粮食。我们的耕地本来就不够，但目前在一部分地区有抛荒撂荒的。本来可以种两熟的，现在只种一熟，近几年的复种指数是下降的，本来可以套种间种增产的，农民为了省出时间去挣钱，也不间种套种了。利用人畜粪尿积攒有机肥，广种绿肥，用地养地，精耕细作历来是中国农民的优良传统，现在城镇的人粪尿农民不用了，绿肥也少种不种了。农民现在有1400亿元的存款，手头还有几百亿现金，每年用在住房建设上有400~500亿，但就是不往农田基本建设上投，现在相当多农民种的是应付田，不求增产卖粮，但求有自己的口粮。“种田为口粮，花钱靠买卖”。相当多的农民的指望已不在农业上，农业怎么还能搞得上去？有人说：“包产到户的潜力已经挖尽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了，这一套不行了。”有的同志还有点后悔“当初没有顶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实行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原来在公社体制下的中国农民是一个解放，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们从中得到了生产、经营、交换、分配的自主权，得到了实惠，极大地激发了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年来农业生产上了新的台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集市繁荣扩张，都是农民努力奋发，迫切要求致富、要求改革、要求改变面貌的表现，广大农民这种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方兴未艾，怎么说包

产到户的潜力已经挖尽了呢？问题是1985年以来，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低了，农用工业和其他工业的价格猛涨，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扩大了，农民种田的成本高，产出少，农民种田特别是种粮食利益太低，种田不上算，种粮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但现在农民务工经商的积极性却是很高的。我们笼统地讲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了是不对的，而农民的农业积极性特别是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下降则是事实，农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农业已经徘徊4年了，这是农业目前最大的问题。

农民问题

10年来，8亿农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还正在发生着更大的变化。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重新认识农民，要制定适合于已经起了深刻变化的8亿农民的政策。

第一，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已经不再是人民公社的社员，而是重新成了土地的主人，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现在的农民已经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可以支配土地、劳力、资金和自有生产资料，去从事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各种行业，可以自主生产、自主交换、自主分配和消费。全国20168万个农户，实际成了2亿多个小小企业。要说变化，这是最本质的变化，农村的一切变化都是由此流觞出来。农民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们就会与市场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就会加速农村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农民作为商品生产者，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调整自己的产业，调整自己的经营内容。对农民这个本质变化，我们有些同志认识不足，估计不足，常常还用老的行政办法去领导，结果常常引起决策的失误。这几年出现了粮食大战、棉花大战、生猪大战，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我们许多同志把握不住自己管了多年的行业和商品，因而感到迷惘，不知所措。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没有适应这个变化了的农民引起的。要适应这个变化，首先就要按照价值规律领导农业，要按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这是我们今后农村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第二，我国农民这个群体的职业结构已经变化了。解放初期我国农村人口中，贫雇农占70%，中农占25%，地主富农占5%左右，经过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成为商品生产者，到1956年绝大部分农民都成了高级合作社的社员，不久又都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虽然在名义上社员仍保留原来的阶级成分，在公社都严格执行着阶级政策，但实际上，吃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社员之间的差别已逐渐拉平了，只有地区之间、队与队之间的差别。

农村实行开放改革以后，随着农村生产结构的变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这10年来农民在职业上已经分化了。1987年按统计来讲，我国有农业人口85713万人，实际上这只是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在这不吃国家商品粮的85713万农民中，有8776个乡镇企业的干部和工人，他们已经从事工业或其他非农产业的生产劳动，并从中取得大部分或全部收入；还有1465万个个体户从事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全国还有400多万民办教员，从事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全国有300万农村妇女在城市当保姆；有100多万农村医护和卫生人员；有100多万人在县乡两级政府和各种机关当合同工或担任干部工作。有

的农民身份的人还承包国营企业，当了国营企业的厂长。这近 10800 万（大约为 7000 万户，占总农户的 35%）农村劳动力已经从事或已经多年从事非农产业，并从该产业中取得大部乃至全部收入。他们有的已经离开农村，在城市中生活，大部分是在乡镇和集镇的乡镇企业里工作。当然，这些人员国家认定的身分还是农民，是农业户口，而且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农村的责任田和农村住宅。

因此，我们就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把这部分人口同继续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区别开来，这样才会产生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这种笼统地简单地区分为农业户和非农业户的方法是极不利的。

第三，8 亿农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开了。1978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134 元，农民人均消费粮食 496 斤，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是 116 元；198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462.55 元，扣除物价因素，平均每年递增 10%，1987 年农民人均消费粮食 508 斤，平均每人年生活消费支出为 398.29 元，扣除物价因素每年增加 11%。就全国范围而言，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但还有 8.24% 约 7100 万农民仍在过着相当艰难的日子。

另外，农村改革以来，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农村涌现了一批“万元户”，近几年又有十几万元户、百万元户、几百万元户出现。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民，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他们对农民特别是中青年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成了赶超的目标。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认识，有一个正确的政策。其一，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民”为数还不很多，新华社 1986 年估计大约在 10 万户左右，这几年又有了发展，现在约有 1% 左右。其二，他们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几十万元以上的户，都不是务农，而是从事工业商业等非农产业致富的，而且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都有雇工等非劳动收入。其三，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靠当地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优惠待遇，如提供贷款、提供原材料或销售渠道等条件扶植起来的典型。其四、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户”生活消费都很大，住的用的都相当“现代化”，往往成为当地被上面来的人参观访问的对象。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民，有相当多的人是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但仍居住在农村的工商业者。千万不能以为他们就是当前农村的农民代表，从他们的收入、生活、消费来判断农村形势，特别是判断农业形势，那是一定会导致失误的。

第四，80 年代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同 50 年代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

一、当代农民文化水平提高了。50 年代时，我国农民 70~80% 是文盲半文盲，在农村里识文断字的很少。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县以下农村人口中 55 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 78.90%，30~54 岁的文盲半文盲只占 43.3%，30 岁以下的文盲半文盲只占 16.9%。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的文化水平更高一些：

二、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大大增强了。自开始改革以来，农民投身到发展商品经济的洪流中，他们的商品经济观念逐渐树立起来。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集镇的周围地区，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已普遍树立起来了。就是在中部、西部，中国的腹部地区，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也发展的很快，很多少数民族的农民、牧民也纷纷上街设摊卖货。

三、农民的传统观念正在迅速变化。传统的中国农民是爱惜耕地，视地如命根的。但经过这30多年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不断更迭，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淡薄了。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对土地有了经营自主权，并且明文规定15年不变，但农民仍感觉不是自己的，不愿在耕地上下功夫，普遍不愿进行力所能及的农田基本建设。相反农民拼命占宅基地、占坟地，一旦到了手，爱护备至，认为这才是自家的。农民重土轻迁的观念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民是恋乡恋家，不轻易迁移的。但现在只要能离农，只要能进城，只要能赚钱，哪里都去。现在涌入城市的农民成千上万，涌到边远地区淘金、挖矿的人也是成千上万。

四、在政治上，30多年来，农民这个大的社会群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50年代、60年代的农民，可以用“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来概括，这反映了农民同我党的关系，无论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社化、农业学大寨，这一系列大的政治经济运动，农民都是跟着党走的。

70年代末，农民强烈要求实行农村改革，我们党顺应民心，率先领导农民实行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大包干中，农民提出了“先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本来是农民针对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提出的分配原则，但在这里也明显地反映了农民的政治态度，农民的国家观念、集体观念是很强的，表明农民是拥护党和国家的领导，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支持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

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商品生产者的地位逐步地确立起来。因此，每当市场的波动、物价的升降，都会对每个农户产生深刻的影响。近几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未变，而工业品价格却上涨了很多，特别是农用工业品价格猛涨，国家价格与市场议价相差一倍乃至几倍，这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对此反映强烈。比如，有的农民就通过贴这样的门联的形式来表示：上联，高价化肥我不买；下联，平价粮食我不卖；横批，请政府原谅。这既反映了农民对乱涨价的不满情绪，也反映了农民要求等价交换的强烈愿望。说明要求等价交换，要求公平交易，要求平等，这是80年代农民的特征。这同50年代以至70年代是大不一样了，我们的农村经济、社会政策也应作相应的改变。

农村问题

中国现在的农村已不再只是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了，农村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首先，农民已有很大一部分人成了乡镇企业职工、个体商贩、乡村教员、农村医生和私营企业主……不过仍以农民的身份居住在农村这个社区而已。其次，农村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1987年农村社会总产值9431.6亿元，其中，农村工业总产值3284.8亿元，占34.82%，农村建筑业723.3亿元，占7.66%，农村运输业334.2亿元，占3.55%，农村商业、饮食服务业413.2亿元，占4.38%。1987年的农村的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只占49.2%，二、三产业则占50.8%。而这还是全国的平均数，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已只占20~30%，农业已不再是农村的主要产业了。

概括地说：农村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农村的上层建筑还没有相应的变化，人们对于农村的观念没有相应的变化，领导管理农村的组织机构没有相应变化，领导管理农村的方式和工作作风也没有相应的变化，由此产生了种种矛盾：

一、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不协调。1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大的发展，但是，农村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进展。在有些地区，经济发展了，但社会问题突出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社会发展、社会进步较之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属于更高层次的问题，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包含的内容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发展进步任务更为艰巨；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的指导思想有关。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工作的领导同志，把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理解为唯一的任务。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考虑的都是如何发展经济，至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问题往往列不上议事日程。即使象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郊区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从经济产值来说，已经超过人均800美元，但社会问题仍然很多。例如，文化教育没有相应发展，中小学生流失很多，产生新的文盲；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一些封建迷信活动重新泛滥。有些东西曾经消声匿迹，这些年又冒出来了。社会秩序不稳定，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发展。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发展，引起许多人的忧虑，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应该在致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要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证明：“富裕并不等于幸福”、“经济水平高并不等于社会进步”。我们应在收入还不大高的条件下，把社会组织得好一些，在还不大富裕的条件下，为群众创造一个民主、进步、幸福的生活环境。不要等到经济发展了，社会问题成堆了，再来治理，代价就大了。

二、农村基层组织瘫痪、半瘫痪。农村在人民公社体制时，政社合一，农民实际上是在半军事化组织管理之下，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个农户实际上是一个小企业，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已经变了，农村社会怎么组织？8亿农民这么大一个群体如何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10年来，县级党政机构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化。1985年人民公社改为乡镇，机构的基本职能和工作内容变化不大，只是换了名称。原来的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大队党支部改为村党支部。多数省区没有设立村的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是土地的发包管理单位。原来是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改为居民小组，多数已没有政治和经济职能，不起什么作用。村一级组织已不是经济实体，多数没有经济来源，有的村要开个会连灯油钱也没有，干部补贴靠向农民摊派解决，许多工作，许多活动开展不起来。在生产上，国家一再强调要建立生产服务体系，搞好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可是，村上一分钱也没有，拿什么服务？在政治上，许多事无人管，有些干部想管也管不了，连个群众会也开不起来。这种基层组织瘫痪、半瘫痪状况，在相当多的省区约占1/3左右，有的地区，情况更严重一些。农村基层原来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了，新的组织形式还未建立好，农村散了，这是农村产生众多问题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

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当前农村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一是要狠下决心,扭转农业生产已经徘徊4年的局面,夺取农业丰收,这是农村发展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二是要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执行放宽搞活的既定方针,使农村继续向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城镇化、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不能由于要抓农业生产,要向农村采购粮食和农副产品而采取一些影响农村全面发展、全面改革的政策,把已经搞活了的局面重又统死,不要走回头路。当然,各地也不能因为要深化农村改革全面发展而放松农业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首先是农村各行各业发展的基础,农业生产在农村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提出以下政策设想。

第一,要大兴调查研究农村之风,重新认识农村,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农业。我们国家的农村是城市领导的,农民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业是为工业和城市服务的,农村政策是由住在城里的干部制订决定的。经过10年改革,农业变了,农民变了,农村变了,我们的农村政策也要作相应的改变,包括领导农村的机构和同农民打交道的形式也要作适当的改变。而要作这些改变,首先要对已经变化了的农村、农民、农业有正确的认识。不足的是,若干年来,我们的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作家等等由于多种原因,很少下乡了。有的去了,也是蜻蜓点水,走马看花。前几年说农村形势好,千口一调,好得不得了,好象农业真的过关了。这两年说农业形势严峻,一时间,好象又什么都紧张了,有的人已在担忧,会不会出现60年代初的情况;有人由此怀疑是不是包产到户搞错了。这种种片面认识之风所以刮得起来,就因为对农村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农村的情况一知半解,若明若暗,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制订政策,是不可能不失误的。所以无论就统一认识,还是制订政策,当务之急,是应该大兴调查研究农村之风,要组织城里干部特别是与农村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深入到农村去,对农村的土地状况、水利设施、乡镇企业、科技教育、农民负担、贫富差别、思想观念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重新认识已经变化了的农村,已经变化了的农民,已经变化了的农业,这是制订各项农村政策的基础,也是制订国家整个政策的基础。

第二,要制订农村发展的长期战略,逐步扭转目前存在的城乡倾斜政策,逐步改变城乡社会分隔的二元结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有一个问题是讨论得很不充分的,就是现有的8亿农民怎么办?我们是搞2亿多人的现代化呢?还是要实现10亿人的现代化?问题是明显摆着的。其一,现在城市计划生育好,年自然增长率为8%,农村计划生育差,年自然增长率为12%,按这样发展下去,农村的人口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数增长都要快于城市,我们总不能越现代化,农民越来越多吧!其二,城乡差别在扩大。据统计局抽样调查,1979年农民人均消费152元,城市居民406元,相差2.7倍,1987年农民人均消费388元,居民979元,相差2.5倍。从数字看缩小了0.2倍,实际不是这样。因为有许多不可计算的因素。如:城市居民住房平均增加一倍多,但房租支出并没有增加,城市的交通道路、煤气、电力、公园绿地、学校医院、公共设施都有国家投资,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些都是未计算在居民人均消费里的。城乡差别在扩大,特别是1984年以后,这是事实,我们总不能越现代化,城乡差别越大吧!

要制订一个完整的农村发展的长期战略。农村怎么现代化？现有的 8 亿农民的大部分怎样逐步转化为工人和第三产业服务人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历史任务。我们的城乡格局，是 50 年代学苏联的办法建起来的，这套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目前我们的格局还是城乡倾斜，工农倾斜的格局。要改变这种格局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首先我们要正视这种格局是不合理的，城乡之间的差别再不能扩大了。其次，我们要逐步缩小这种差别，逐步改变目前城乡社会分割的二元结构。过是我们今后做计划、办事情应该常考虑的问题。

第三，保护农业，保护农民，从中央到地方应建立领导农村发展的机构。农业因作业空间大，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在现代生产中与其他产业相比，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有根据各自特点的保护政策。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更需要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农民在我国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阶层，但由于其居住分散，文化水平低，组织程度差，同其他阶层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加上我国农民都是在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生产活动（工人和知识分子多数是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劳动和工作）农民都是农业户口（工人和知识分子都是非农户口）工人有工会、知识分子也有工会，还有各种学会等……而中国农民至今连个农会也没有。这就使农民在社会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所以，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社会权益更应得到国家和政府的保护。保护农业，保护农民，有诸多方面，要从长计议。就目前情势看，首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农村发展的领导机构，制订并实施农村发展的长期规划，领导、组织、保护农民，组织、领导农业生产。1983 年机构改革中自上而下撤销了农委。5 年的实践证明，其后果是对农业生产不利，对农民不利，对农村发展不利。1986 年以后又重申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国策，这几年也反复宣传了，但农业为基础，要有政治保证，要有组织路线的保证。现在多数省区，一般是由一个副省长、副专员、副县长、副乡长管农业，他们不参加党委常委决策层，权力有限，有些还不是专职的。所以，搞农业基本建设，要不到投资；到春耕时，筹不到农贷；抗旱时，管不了电和柴油；施肥时，抓不到化肥。这几年农用生产资料，如此紧缺，如此飞涨，这与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管是有关系的。

农业需要保护、农民需要保护，应该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主管农村发展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

第四，按价值规律办农业，按价值法则同农民打交道，逐步建立农村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粮食和农产品是商品，农业生产是商品生产，领导农业应该按价值规律办事；农民是商品生产者，要按价值法则来同他们打交道。这是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领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验和教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40 年来，凡是我们的农村政策符合价值规律，农民就拥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高涨，农业生产就发展；凡是我们的农村政策背离价值规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受到挫伤，农业生产就停滞、徘徊以至倒退。在这 10 年中，农村的乡镇企业，水产业、水果业是逐年以较高的发展速度递增的。这种现象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不同的，这是因为那时的农村政策是高度统一的，而在这 10 年中，乡镇企业、水产业、水果业的政策是放开的，在这几个行业中，执行了比较符合价值规律的政策。

当然,要按价值规律办农业,要按价值法则同农民打交道,特别是要在农村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这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一系列改革和发展。就目前来说,最关键的有两个方面,其一,要调整工业、农业的关系。当前粮食、棉花和一些农产品短缺,而工业建设过热,农业再次成为国民经济的短线。国家应该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调整工农投资的比例,增加农业投资,增强农业的物质基础,这不仅是克服当前农业徘徊的措施,而且也是90年代农业要上两个台阶的基础条件。要增加农业投入,这已是上下一致的看法,中央已经提出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方针。根据历史经验和目前的水平,国家在每年基建投资中,农业投资应达到10%,地方(省、地、县)财政应有20%用于农业,集体和农民的收入中应有30%用于农业建设。其二,要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20~30%,工业产品价格高于价值15~20%。根据三中全会决定,1979年和1980年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这几年工农产品剪刀差又扩大了,大到又恢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状况,严重挫伤了农民务农特别是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亟需调整。

第五,重视研究和治理农村社会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过去若干年,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既是经济目标,也是社会目标,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小康水平的经济目标,是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小康水平的社会目标应该是社会安定团结、政治清明、民主进步、党风民风正、精神面貌好。整个社会应该是奋发向上的,朝气蓬勃地去实现第三个目标。从世界各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由人均400美元发展到1000美元的时期,却又是社会矛盾多,社会变动快,各种社会问题大量出现,社会动荡不安,可能出现社会发展失控、离轨的现象,以致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正常发展。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却正处于这个发展阶段。经过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农民生活都有了很多改善,但新的社会矛盾出现了。城乡之间,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先富起来的农民和还不富裕的农民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务农的农民和务工的农民之间,都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当前农村中农民群众意见最多的是以下几个问题,农用生产资料紧缺,价格暴涨;粮食和农产品订购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太大,农民失利太多;党风不正,官风不正,有些干部只敛钱,不办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克服、缓解和解决,就可能激化为社会冲突。这些孕育着的不安定因素,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所以,我们在实行农村第二步改革的时候,既要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同时也要进行社会方面的改革,在致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社会发展。引导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地协调发展。我们应在农村还不太富裕的条件下,把农村社会组织得更好些,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和睦、民主、进步、幸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以加速整个农村发展的历史进程,顺利实现我国农村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伟大目标。